

#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A 级景区的空间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袁 丹, 吴润涵, 李 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以黄河流域 9 省区 115 个地级市为研究区域,利用核密度估计、数量空间关系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定量剖析黄河流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A 级景区之间的空间关系,同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影响二者空间关系的主导因子。研究表明: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关系,其空间聚类模式呈现显著的“高一高”类与“低一低”类分布范围较广且连片集聚,“高一低”类与“低一高”类分布范围窄且较为分散的特点;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从黄河上游到下游大致呈现“正向错位—负向错位”的分布特征;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不同类型空间关系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二者空间关系的主导性因子异质性显著。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A 级景区; 空间聚类模式; 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2024)05-0047-15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化遗产<sup>[1]</sup>,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sup>[2]</sup>。A 级旅游景区是由国家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授权省旅游局,依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国家标准进行评审的景区。它是展现地方文脉的重要载体,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组织核心和物质依托。地方政府常常将提升 A 级景区吸引力和建设新景区作为促进区域文旅融合的主要手段<sup>[3]</sup>。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理论上是具有高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但多数 A 级景区在建设运营过程中会重视物质文化资源的利用,而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因此,要推动非遗与 A 级景区融合发展,支持非遗有机融入 A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创知识扩散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内企业‘双效’的影响机理研究”(72004175)。

**作者简介:**袁丹(1985—),女,陕西咸阳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发展与创新、文化旅游与区域发展;吴润涵(2000—),男,安徽安庆人,202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旅游与区域发展;李东(1999—),男,陕西咸阳人,202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

级景区,鼓励非遗特色景区发展<sup>[4-5]</sup>。

## 一、文献综述

“非遗融入旅游空间”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非遗+博物馆”“非遗+民宿”“非遗+旅游文创”“非遗+旅游节庆”“非遗+旅游演艺”等多种旅游形式<sup>[6]</sup>,不少非遗被引入景区,成为景区常驻项目或临时展演项目。目前,国内对非遗的研究聚焦于价值研究<sup>[7-8]</sup>、体系重构<sup>[9]</sup>、法律完善<sup>[10-11]</sup>、保护传承<sup>[12]</sup>、时空分异<sup>[13-14]</sup>、旅游开发<sup>[15-16]</sup>等方面。对A级景区的研究则侧重对网络关注度<sup>[17]</sup>、空间结构<sup>[18-19]</sup>、景区门票价格<sup>[20]</sup>、游客行为<sup>[21]</sup>的分析。关于非遗和A级景区空间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韩荣培等研究发现,贵州省少数民族非遗的空间结构和文旅产业存在相关性<sup>[22]</sup>;鄢继尧等提出,全国层面上非遗与A级旅游景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sup>[23]</sup>;周成等研究发现,A级旅游景区数与非遗数呈现一定的空间联系<sup>[24]</sup>;王立明等研究证明了新疆国家级非遗、自治区级非遗与A级景区具有明显的相关性<sup>[25]</sup>;田小波的研究表明甘肃省A级景区数量对非遗分布存在正向影响<sup>[26]</sup>。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非遗与A级景区空间关系的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研究内容的局限性。近几年,国内对非遗与A级景区空间关系的研究集中于二者存在一定的空间关系或是验证二者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并未深入探讨其存在何种空间关系以及造成这种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其次,研究区域的局限性。对非遗与A级景区空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或省域尺度,对区域间二者空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以黄河流域9省区115个地级市为研究区域,采用定量的分析方法探讨黄河流域非遗与A级景区的空间分异特征以及两者的空间关系,并运用数理模型剖析影响二者空间关系的影响因子。

##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区域概况

黄河自西向东流经位于上游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中游的陕西、山西,下游的河南和山东9个省级行政区。黄河流域内分布有半坡、老官台、裴李岗、仰韶、龙山、西侯度等黄河文明遗迹,并孕育了河湟、河洛、河套、关中、三晋、齐鲁、中原、草原等地域文明,遗留下数以万计的文化遗珠<sup>[27]</sup>。同时,黄河横跨我国四大地貌单元,流域地貌景观从上游的青藏高原、中游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到下游的华北平原等,为自然型景区建设提供了独特的自然环境条件。黄河流域的13条主要支流都是当地早期人类文化遗址的发源地,为人文型旅游景区赋予了黄河流域独有的

文化特质<sup>[28]</sup>。黄河流域目前拥有世界遗产 20 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 024 项、不可移动文物 30 余万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84 个、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85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329 个,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 (二) 数据来源

截至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先后公布了 5 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名录,经统计获得黄河流域国家级非遗数量共计 1 042 项(含拓展项)。A 级景区数据来自各省(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 A 级旅游景区名录(截至 2023 年 5 月),共计 4 655 个。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的空间坐标由百度地图坐标拾取器根据非遗的申报地区、保护单位以及 A 级景区的名称、地址定位获取。行政区划、流域边界等矢量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自然地理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社会经济、文化旅游数据来源于 2022 年各省份及各地级市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2022 年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等。

## (三)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 Arcgis 10.8 软件中的核密度分析分别呈现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其次,运用数量空间关系模型验证二者在空间分布上是否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再次,计算二者空间错位指数来揭示二者空间分布的相似性;从次,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二者在空间上的局部聚集特征;最后,选取地理探测器探测造成二者不同空间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 1. 核密度

核密度分析主要通过分析点要素在地理空间中分散或集聚的特征,来反映点要素空间聚集的范围、位置及强度,是体现点要素分布稀疏程度的重要指标<sup>[29]</sup>。通过核密度分析法得到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核密度分布图,实现空间可视化,分析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的分布特征。计算公式为:

$$f(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1)$$

式(1)中: $f(x)$ 为核密度估计值; $k\left(\frac{x - x_i}{h}\right)$ 为核函数; $n$ 为要素个数; $h$ 为带宽; $(x - x_i)$ 为估计值点到核心点 $x_i$ 的距离值。

### 2. 数量空间关系模型

数量空间关系模型可以评价研究要素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借鉴生态学景观要素空间关联分析方法,分析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的空间关系。其

数量空间关联指数  $R$  计算公式为:

$$R = \frac{ad - bc}{\sqrt{(a+b)(c+d)(a+c)(b+d)}} \quad (2)$$

式(2)中:  $R$  取值范围为  $[-1, 1]$ ,  $R > 0$  为正关联,  $R < 0$  为负关联;  $a$  为全部样方中同时包含非遗与 A 级景区的样方数;  $b$  为仅包含非遗的样方数;  $c$  为仅包含 A 级景区的样方数;  $d$  为全部样方中同时不包含非遗与 A 级景区的样方数。

$R$  值显著性检验的公式可表示为:

$$X^2 = \frac{n(ad - bc)^2}{(a+b)(c+d)(a+c)(b+d)} \quad (3)$$

若  $|X^2| > X_a^2(1)$ , 说明非遗与 A 级景区之间数量空间关系联系显著; 若  $|X^2| < X_a^2(1)$ , 说明两者关联关系不显著。

### 3. 空间错位指数

空间错位指数可从微观上揭示研究要素空间分布的相似性, 相似程度越高, 说明空间错位程度越低, 反之则说明空间错位程度越高<sup>[30]</sup>。计算黄河流域各地级市非遗与 A 级景区的空间错位指数  $SMI$ , 揭示二者的空间错位类型及错位程度。计算公式为:

$$SMI = \frac{1}{A_i} \left[ \frac{c_i}{C_i} A_i - a_i \right] \times 100 \quad (4)$$

式(4)中:  $c_i$  是各地级市非遗数量;  $C_i$  是黄河流域非遗总数;  $a_i$  是各地级市 A 级景区的数量;  $A_i$  是黄河流域 A 级景区总数。

### 4.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能够反映两个不同属性变量空间关系的局部集聚特征<sup>[31]</sup>, 揭示二者的空间聚集关系。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黄河流域各地级市非遗与 A 级景区在空间分布上是正相关的“高一高”类<sup>①</sup>或“低—低”类, 还是负相关的“低—高”类或“高一低”类。公式为:

$$I_{ca}^i = \frac{X_c^i - \bar{X}_c}{\delta_c} \times \sum_{j=1}^n W_{ij} \times \frac{X_a^j - \bar{X}_a}{\delta_a} \quad (5)$$

式(5)中:  $X_c^i$ 、 $X_a^j$  是地域非遗密度  $i$  和 A 级景区密度  $j$  的值;  $\bar{X}_c$ 、 $\bar{X}_a$  分别是非遗密度、A 级景区密度的平均值;  $W_{ij}$  是空间权重矩阵;  $\delta_c$ 、 $\delta_a$  是非遗、A 级景区的方差。

### 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探测空间的分异性, 分析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统计

①非遗密度高—A 级景区密度高, 简称“高一高”类; 非遗密度低—A 级景区密度低, 简称“低—低”类; 非遗密度高—A 级景区密度高, 简称“高一低”类; 非遗密度低—A 级景区密度高, 简称“低—高”类。

学方法<sup>[32]</sup>。本文利用因子探测对造成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不同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识别各因子 (X) 多大程度上解释了非遗与 A 级景区不同的空间关系, 识别出影响其空间关系的主导因子。因子探测公式为:

$$q = 1 - \frac{\sum_{h=1}^L N_h \sigma_h^2}{N \sigma^2} \quad (6)$$

式 (6) 中:  $L$  是第  $h$  类自然因子的分类数;  $N$  为整个研究区域的单元数;  $N_h$  为探测要素  $h$  内的单元数;  $\sigma_h^2$  和  $\sigma^2$  分别为所探测要素层和全研究区单元密度值的方差。

### 三、黄河流域非遗、A 级景区的空间特征及其空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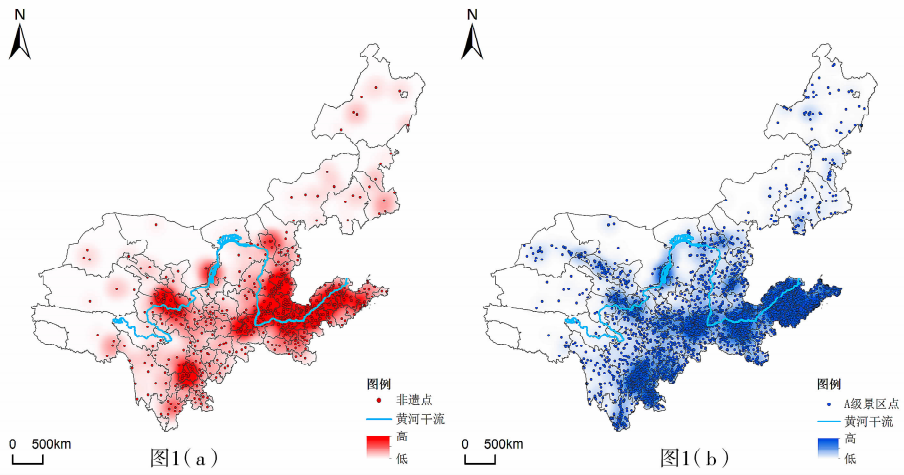
#### (一) 空间特征

##### 1. 非遗的空间特征

如图 1(a) 所示: 就黄河上游、中游、下游 3 个地域而言, 非遗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中下游地区聚集连片、上游地区整体分散、局部聚集的态势。非遗空间分布呈现出了三个高密度核心区和两个次密度核心区。其中: 三个高密度核心区分别为覆盖山西省中部和南部 (太原、晋中、临汾、晋城、运城)、关中 (咸阳、西安、渭南)、河南省中北部 (焦作、郑州、新乡、鹤壁、安阳) 和山东省中部 (济南、淄博、泰安) 的“N”字形区域, 青海省东部与甘肃省西南部交界处的区域 (西宁市、海东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兰州市) 以及四川省中部 (成都、德阳、眉山) 的地区; 两个次密度核心区主要辐射宁夏北部 (银川、石嘴山) 等区域, 以及内蒙古中南部 (呼和浩特、乌兰察布) 与山西北部 (大同、朔州) 交界处的地区。

##### 2. A 级景区的空间特征

如图 1(b) 所示: 就黄河上游、中游、下游 3 个地域而言, 黄河流域 A 级景区局部集聚特征明显, 整体上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布形态, 即黄河流域中下游集聚而下游相对分散。A 级景区空间分布呈现出四个高密度核心区和两个次密度核心区。其中: 四个高密度核心区分别为以山东济南为核心, 辐射至鲁中 (泰安、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潍坊、东营) 等地; 以河南郑州为核心, 辐射至豫中与豫北 (洛阳、平顶山、许昌、开封、新乡) 等地; 以陕西西安为核心, 辐射至关中 (咸阳、渭南、铜川) 等地; 以四川成都为核心, 辐射至雅安、眉山、德阳等地区。两个次密度核心区涵盖了以四川自贡为核心辐射的内江、宜宾等地, 以及以宁夏银川为核心辐射的石嘴山等地。可以发现, 黄河流域非遗分布的空间格局与 A 级景区具有较强的耦合性, 二者都较多地集中在历史底蕴深厚、温度适宜、降雨量充足、地势平坦的平原与丘陵地带。



审图号：GS（2022）1873

图 1 非遗和 A 级景区核密度分布图

## （二）空间关系

### 1. 数量空间关系

为了清晰直观地反映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的数量空间关系，运用 ArcGIS 软件将 1 042 项国家级非遗和 4 655 个 A 级景区在地图上进行取点，生成两者的空间分布图层。借鉴陈严武等的做法，将黄河流域行政区域图分为间距均为 20 km 的 15 141 个网格样方，同时将样方图 and 空间分布图层进行叠加<sup>[33]</sup>，得到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数量空间分布样方分解图（见图 2）。由图 2 可以看出，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的分布区域相似度较高，非遗分布聚集的地区同时也是 A 级景区聚集的地区，而非遗分布分散的地区，A 级景区分布相对分散。对样方进行统计得出，同时包含非遗与 A 级景区的样方数为 391 个，仅出现非遗的样方数为 483 个，仅包含 A 级景区的样方数为 2 290 个，均不包含非遗和 A 级景区样方有 11 977 个，即  $a = 391$ 、 $b = 483$ 、 $c = 2290$ 、 $d = 1197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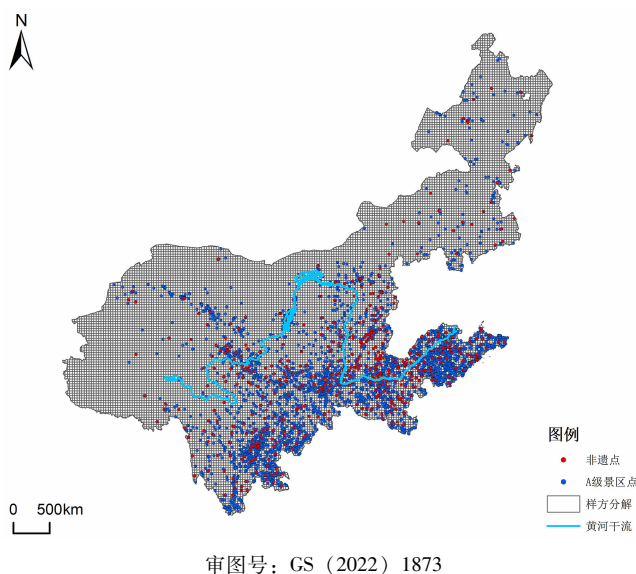
将数据代入公式（2）计算得到：

$$R = \frac{391 \times 11977 - 483 \times 2290}{\sqrt{(391 + 483) \times (2290 + 11977) \times (391 + 2290) \times (483 + 11977)}} = 0.175$$

将数据代入公式（3）计算得到：

$$X^2 = \frac{15141 \times (391 \times 11977 - 483 \times 2290)^2}{(391 + 483) \times (2290 + 11977) \times (391 + 2290) \times (483 + 11977)} = 465.07$$

查阅  $X^2_a(1)$  分布表可得：当显著性水平  $\alpha = 0.05$ ， $X^2 = 465.07 > X^2_a(1) = 3.841$ ，可见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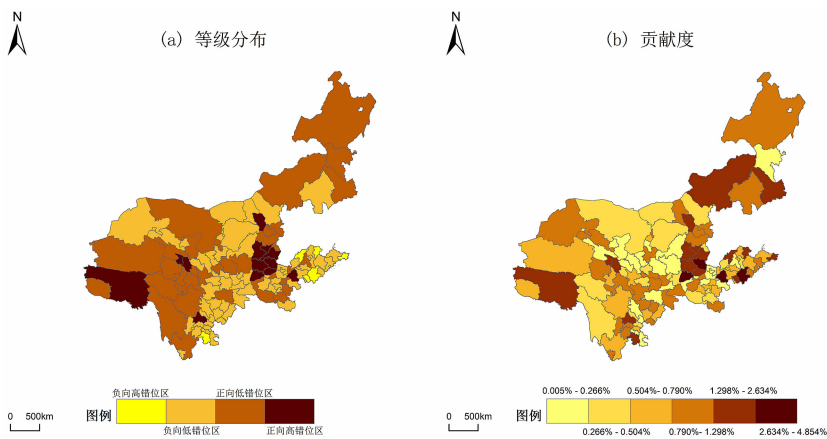
审图号: GS (2022) 1873

图2 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及样方分解

2. 错位关系

借鉴曾通刚等的做法，将黄河流域 115 个地级市空间错位划分为四种类型：正向高错位区（ $SMI \geq 0.009$ ）、正向低错位区（ $0 \leq SMI < 0.009$ ）、负向低错位区（ $-0.009 \leq SMI < 0$ ）和负向高错位区（ $SMI < -0.009$ ），并据此计算平均贡献度<sup>[34]</sup>。如图 3 所示，正向错位区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上游地段，如山西、内蒙古、青海等省份，其特征为非遗的发展水平先前于 A 级景区发展水平，非遗丰富但 A 级景区较为稀缺。山西省被称为“华夏之根”“黄河之魂”，是三晋、开唐等文化的起源地，文化底蕴深厚，而山西近现代以来，致力于发展能源与重工业，各地市旅游业发展水平处于不均衡状态。以忻州、朔州、阳泉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忽视对 A 级景区的修缮保护，导致其部分损毁<sup>[35]</sup>。内蒙古和青海作为草原、河套、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留下了众多民族特色鲜明的非遗，但内蒙古和青海多为干旱与半干旱地区，降水较少。同时，两省区地貌辽阔，A 级景区集聚程度低，公路条件差，旅游时间成本、交通成本高，难以组合全区域的旅游线路，不利于全区旅游一体化的发展。负向错位区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与下游地段，如甘肃、四川、山东等省份，其特征为非遗发展水平落后于 A 级景区的发展水平，地区 A 级景区较为丰裕而非遗相对匮乏。甘肃省地域广阔，民族风情浓郁，人文景观悠远，政府扶持力度较大，旅游业发展较为迅速。四川和山东作为旅游大省，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四川被誉为“风景省”，其北连甘肃、青海、陕西，南接云南，东邻重庆，无论是民族风情还是自然、人文景观都分布广泛且种类繁多，是中国拥有国家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区，其中的乐山大佛、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等景观都具有垄断性与

不可复制性。山东地处黄海之滨和黄河入海口，北临天津、北京，南连江苏、上海，有着秀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人文景观，旅游景区众多。正向高错位区与负向高错位区分别较多集中于山西省与山东省。山西作为文化大省，需兼顾旅游业的同步发展，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旅游品牌，利用与保护古城、宗族祠堂和晋商大院等资源，在其中融入三晋文化，逐步实现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山东作为文化与旅游大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应相对均衡，但因地理环境、政府政策等原因，旅游产业较文化产业发展更为迅速。因此，对于威海、临沂等负向高错位的地级市，应给予更多文化政策的支持，以便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当地非遗，实现山东省文化旅游共同繁荣发展。



审图号：GS（2022）1873

图 3 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的空间错位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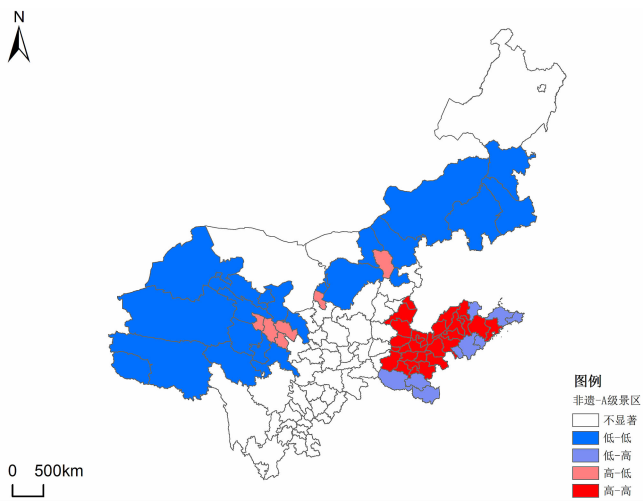
3. 空间相关性

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对非遗和 A 级景区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从图 4 可以看出，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的空间聚类模式整体呈现显著出“高一高”类与“低—低”类分布范围较广且连片集聚，而“高一—低”类与“低—高”类分布范围窄且较为分散的特点<sup>[36]</sup>。

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的空间局部集聚情况是：“高一—高”类主要分布在河南大部（郑州、洛阳、开封、许昌、平顶山、新乡、安阳等地）、山东大部（济南、泰安、淄博、青岛、济宁、菏泽、潍坊等地），以及山西的晋城、长治、晋中、阳泉。这些地区非遗分布密度较高，非遗保护传承较好的同时表现出良好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非遗的发展及旅游资源的传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协同发展。“低—低”类主要集中在青海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甘肃的酒泉、嘉峪关、张掖、金昌、武威、白银、甘南藏族自治州，内蒙古的乌海、鄂尔多斯、包头、乌兰



察布、锡林郭勒、赤峰、通辽、兴安盟以及山西朔州。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多处于干旱区与高原地带。在缺少资金支持及政策扶持的情况下，景区公共基础设施欠佳、环境落后、空心化严重，非遗也失去良好的传承条件，导致两者难以实现持续性发展。“高一低”类分布在青海的西宁和海东，甘肃的临夏和兰州，宁夏的银川，以及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青甘地区的河湟文化，宁夏与内蒙古地区的河套文化属于黄河流域四大优秀传统文化，河湟地区的戎人、羌人、鲜卑、小月氏、鞑靼、吐谷浑、吐蕃等古代民族不仅从事高寒畜牧业，还积极与周边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民谚“西宁的赋子，兰州的鼓子”也隐喻了河湟地区文化的繁荣，但因其处于高原地带，气候环境、公路通达性较差，不利于景区的生存与发展，导致该区域 A 级景区分布较少。“低一高”类分布在河南的南阳、驻马店、信阳以及山东的枣庄、临沂、日照、威海、烟台、东营。



审图号：GS（2022）1873

图4 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分布的 LISA 聚类图

四、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及指标选取

非遗和 A 级景区的形成发展及两者的空间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本文参考已有的非遗项目<sup>[37]</sup>、A 级景区<sup>[38]</sup>空间分布的研究文献，根据研究区内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文化旅游资源等方面的差异性，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文化旅游三类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解释变量及指标如表 1 所示。海拔对区域内经济发展与人口密度有重要影响，从而影响非遗与 A 级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黄河孕育千年的农耕文明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选取与农牧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气温、降雨量作为指标对区域内气候环境进行表征。经济发展、政府主导、城市化与

交通通达性为非遗与 A 级景区的发展与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选取人均 GDP、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城镇化率、公路里程对区域社会经济环境进行表征。文化设施水平、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与政府支出的文化旅游事业费对非遗与 A 级景区的生存环境具有良性效益。因此,选取文化场馆数量、旅游接待人次、文化旅游和体育传媒支出表征区域文旅发展情况。并且借助 ArcGIS 10.8 软件对解释变量进行了重分类处理,以消除因素量纲的影响,增强各因素之间的可比性。

表 1 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类型的影响因素

变量类型	解释变量	指标
自然地理维度	地形	平均高程 (m)
	气温	平均气温 (℃)
	降雨量	平均降雨量 (mm)
社会经济维度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元)
	城市化	城镇化率 (%)
	政府主导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交通通达性	公路里程 (km)
文化旅游维度	文化设施	文化场馆数量 (个)
	旅游市场环境	旅游接待人次 (万人次)
	文化旅游事业费	文化旅游和体育传媒支出 (亿元)

(二) 空间因子探测分析

为探寻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不同类型空间关系的主导因素差异,运用地理探测器对“低—低”类地域、“低—高”类地域、“高—低”类地域以及“高—高”类地域分别进行因子探测分析。由表 2 可知,在“低—低”类地域中,气温、公路里程与人均 GDP 是主导因素。“低—低”类各城市年均气温为 4℃,寒冷的天气不适宜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影响人才的流入,导致非遗的保护传承与 A 级景区的发展普及缺少人才的支撑。交通区位及条件较差的地区无法较好地解决非遗和 A 级景区的可进入性问题。交通通达性高的地域有利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满足消费者的文化感知需求与休闲娱乐需求,激发两者的原生活力。“低—低”类中的嘉峪关市、乌海市、金昌市的公路里程分别为 1 103 km、1 171 km、2 497 km,较短的公路里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上限。在“低—低”类的 22 个城市中,有 10 个地级市人均 GDP 不达 50 000 元,其中最低为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人均 16 729 元。经济落后严重限制了非遗与 A 级景区的生存与保护,因此这些地区非遗与 A 级景区分布较少。在“低—高”类地域中,气温、公路里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旅游接待人次为主导因素。

“低—高”类地级市年均气温为 15℃，同时这些地区的公路里程的平均值为 19 565 km，较好的交通通达性为人们出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低—高”类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均值为 545 亿，在四种类型中仅次于“高一高”类，说明同时位于低密度非遗区域时，政府更愿意把预算支出倾向于地区的旅游业，所以此类区域 A 级景区的发展与保护优于非遗。该类型区域旅游接待人次均值为 4 131 万人次，是四种类型中最高的。旅游接待人次多，表明当地旅游热度高，旅游产出绩效相应较高，较高的旅游效益又能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适宜的出游温度、良好的公路通达性、政府主导旅游业发展以及较高的旅游热度都推动了区域的旅游业发展。在“高一低”类中，文化场馆和城镇化率是主导因素。“高一低”类各地市文化场馆数量均值与城镇化率在四种类型中均位列第一。文化场馆是保护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文化馆、博物馆这样的专业机构能为非遗相关的展览等活动提供场馆支持，还能为非遗传承提供人才支撑和经费保障，提升了非遗的传播普及力度。同时较高的城镇化率也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如非遗数字化的保护形式需要良好的城市化作为基础与依托。村庄化景区是旅游景区的一类，其处于城镇化率较低的传统村落之中，传统村落有趋向于低城镇化水平地区特征<sup>[39]</sup>。因此，高城镇化不利于此类旅游景区的生存发展。在“高一高”类中，文化旅游维度的文化旅游事业费是重要的主导因素。说明政府在文化旅游事业费的投入对非遗与 A 级景区的发展保护有巨大的良性作用，该类型中各地市文化旅游和体育支出均值为 8 亿元，为四种类型之最高。政府应加大文化旅游事业经费的投入，促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表 2 黄河流域非遗与 A 级景区分布类型的影响因素地理探测

影响因素	低—低		低—高		高一—低		高一—高	
	q 值	P 值	q 值	P 值	q 值	P 值	q 值	P 值
平均高程	0.236	0.000	0.230	0.031	0.384	0.000	0.343	0.000
平均气温	0.503	0.000	0.736	0.000	0.325	0.000	0.363	0.000
平均降雨量	0.305	0.000	0.209	0.000	0.194	0.000	0.013	0.155
人均 GDP	0.406	0.000	0.385	0.009	0.448	0.000	0.137	0.000
城镇化率	0.094	0.000	0.482	0.000	0.580	0.000	0.145	0.0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350	0.000	0.567	0.000	0.402	0.000	0.208	0.000
公路里程	0.407	0.000	0.581	0.000	0.225	0.000	0.188	0.000
文化场馆	0.299	0.000	0.308	0.068	0.820	0.000	0.371	0.000
旅游接待人次	0.372	0.000	0.491	0.000	0.241	0.000	0.117	0.000
文化旅游和体育 传媒支出	0.228	0.000	0.243	0.232	0.627	0.000	0.546	0.000

## 五、结论与讨论

### (一) 结论

本文运用核密度估计、数量空间关系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黄河流域非遗与A级景区之间的空间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黄河流域非遗与A级景区的数量在区域间差异较大,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关系,其空间聚类模式呈现显著的“高一高”类与“低—低”类分布范围较广且连片集聚,“高一低”类与“低—高”类分布范围窄且较为分散的特点。

第二,黄河流域非遗与A级景区的空间错位从黄河上游到下游大致呈现“正向错位—负向错位”的分布特征。正向错位区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上游,正向高错位区主要集中在山西省。负向错位区集中在黄河下游,负向高错位区主要集中于山东省。

第三,黄河流域非遗和A级景区不同空间关系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不仅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交通通达性、政府主导,还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有地形、气温、降水量,还受到文化旅游因素的影响,如文化场馆数量、旅游接待人次、文化旅游事业费。造成非遗和A级景区空间关系呈“低—低”类、“低—高”类、“高一低”类、“高一高”类四种分布类型的主导性因子异质性显著。

### (二) 讨论

第一,本文以黄河流域非遗与A级景区作为研究对象,对二者的空间关系及造成不同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黄河流域非遗、A级景区区域间数量差异较大,分布不均衡,二者集聚分布区域的空间重叠度较高,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耦合性。已有研究通常针对黄河流域非遗、A级景区单一视角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本文增加了二者空间关系的影响机理及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聚类区域的影响,揭示了二者空间关系的区域差异,拓展了黄河流域两种资源协同开发保护的空间性视角,研究结果为黄河流域非遗与A级景区的有效保护和整合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思路。

第二,造成黄河流域非遗与A级景区不同类型空间关系的主导性因素不同,应对不同类型区域采取差异化对策以实现两者协调发展。对于“高一高”类区域,应在文化消费需求的带动下,建设智慧管理和服 务系统,培育和发展新业态,完善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等,通过跨区域、多部门协同联动、系统开发,强化此类区域“非遗+旅游”的产业化集聚效应,形成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集聚优势,发挥其辐射作用。对于“高一低”

类区域, 政府可在充分利用这个非遗“容器”的基础上, 通过影视、动漫、主题公园等形式实现对非遗的深度开发与活化传承, 打造具有联动效应的板块功能区, 借力非遗文化特色塑魂, 通过非遗文化品牌赋能, 把不同类别的非遗通过多种方式融入旅游产业之中, 驱动文化和旅游产业经济带的形成。对于“低—高”类区域, 一方面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建设规划, 建立数字影像资料库, 同时对群众艺术馆、数字非遗展馆等资源进行整合, 实现链群式发展。加强非遗的研究和认定工作, 开展非遗普查和记录工程,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 适度开发保存较好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要发挥区域旅游业的优势, 通过旅游这一形式进一步提高非遗的可见度、影响力, 促进非遗的传播和合理利用, 以非遗特色景区建设等为抓手, 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对于“低—低”类区域, 应加强政策引导, 优化管理体制, 加大经费投入, 加强黄河纪念馆等项目的保护修缮、文化挖掘和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水平, 增强消费吸引力。以地形起伏为特色, 沿线系统设计符号性的文化公园景观, 形成区域协同模式。提高景区的通达性,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产业体系和景区的服务系统进行数字化升级, 增强消费的体验性。提高非遗与 A 级景区的保护和利用效果, 助力黄河国家流域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林琰, 李惠芬.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活化路径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 (3): 151-160.
- [2] 李如友, 石张宇.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关系及形成机理 [J]. 经济地理, 2022, 42 (8): 205-212.
- [3] 高燕, 孙根年. 中国 A 级景区空间关联性及异质性分析 [J]. 经济地理, 2022, 42 (12): 194-204.
- [4] 任辉, 郇雨菲. 长江中游城市群 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23, 40 (5): 1-14.
- [5] 苑利, 顾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的“功”与“过” [J]. 旅游学刊, 2021, 36 (5): 5-8.
- [6] 宋晓, 梁学成, 张新成, 等. 非遗进景区: 多主体价值共创的逻辑与机制: 多案例研究 [J]. 旅游学刊, 2022, 37 (11): 85-100.
- [7] 石美玉. 基于价值共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价值增值研究 [J]. 经济纵横, 2022 (12): 118-124.
- [8] 赵鹏燕, 曲木铁西. 现代学徒制传承少数民族非遗技艺的理论与价值体系研究 [J]. 文化遗产, 2023 (2): 35-42.
- [9] 赵博文, 李克军. 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体系构建的逻辑机理与创新实践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 44 (1): 215-221.
- [10] 刘勇军. 中国非遗惠益分享立法的逻辑与模式 [J]. 文化遗产, 2022 (1): 17-23.
- [11] 李荣光.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国家给付义务 [J]. 文化遗产, 2023 (2): 27-34.

- [12] 姚国章, 刘增燕. 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实践借鉴 [J]. 东南文化, 2022 (6): 179-185.
- [13] 田磊, 孙凤芝, 张淑嫔.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 (5): 186-192.
- [14] 张涵, 刘会成. 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2, 41 (6): 93-98.
- [15] 艾斯卡尔·巴吐尔, 敬龙军, 张军爱, 等. 新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及提升路径 [J]. 体育文化导刊, 2023 (1): 104-110.
- [16] 刘宇青, 徐虹.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和旅游开发助推乡村振兴 [J]. 社会科学家, 2022 (10): 69-75.
- [17] 罗婉琳, 王芳, 丁志伟. 中国红色景区抖音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J]. 经济地理, 2023, 43 (3): 198-210.
- [18] 刘亚晶, 罗静, 孙建伟, 等. 2018年湖北省旅游供需的空间结构特征分析: 以A级景区为例 [J]. 人文地理, 2021, 36 (2): 175-183.
- [19] 陈慧霖, 李加林, 王中义,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空间结构特征与影响因子分析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 (9): 2467-2484.
- [20] 张凌云. 景区门票价格与门票经济问题的反思 [J]. 旅游学刊, 2019, 34 (7): 17-24.
- [21] 王耀斌, 陈海龙, 刘逸, 等. 网络集群行为视角下游客情绪脉搏时空特征研究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2, 41 (3): 95-100.
- [22] 韩荣培, 梁坤. 贵州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结构及文旅关系分析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41 (9): 69-76.
- [23] 鄢继尧, 赵媛, 郭宇, 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异及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3, 39 (4): 86-95.
- [24] 周成, 周霖, 张旭红.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多类别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3, 39 (2): 72-80.
- [25] 王立明, 陆亦农, 李啸虎, 等.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旅游活化机制研究 [J]. 干旱区地理, 2022, 45 (6): 1968-1977.
- [26] 田小波, 胡静. 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格局及旅游利用研究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1, 55 (6): 1073-1082.
- [27] 周成, 靳轶婷, 周霖, 等. 黄河流域文保单位多尺度空间差异及其与地理环境空间关系研究 [J/OL]. 世界地理研究: 1-13 [2023-05-04].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31.1626.P.20230428.1850.002.html>.
- [28] 张宇硕, 沈雪瑞, 眭任静, 等. 黄河流域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尺度分析 [J]. 中国沙漠, 2022, 42 (6): 103-115.
- [29] 杨友宝, 邓巧. 湖南省红色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公路可达性研究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 (4): 793-804.
- [30] 李如友, 石张宇. 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空间错位及其机理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2, 38 (5): 129-137.
- [31] 邵雅静, 杨悦, 员学锋. 黄河流域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互动关系 [J]. 水土保持学报, 2022, 36 (3): 86-93, 99.
- [32] 李建辉, 胡苗苗, 张丹, 等. 黄河流域文物古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干

- 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 (10): 194–201.
- [33] 陈严武, 韦福安. 特色村镇与 A 级景区的空间关系及协同发展: 以广西为例 [J]. 旅游学刊, 2020, 35 (3): 113–126.
- [34] 曾通刚, 赵媛.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化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匹配 [J]. 地理研究, 2019, 38 (6): 1497–1511.
- [35] 韩瑛, 贾林雨, 张成莉, 等. 山西省古建筑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 (1): 196–202.
- [36] 田磊, 史冰心, 孙凤芝, 等.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 37 (3): 186–194.
- [37] 慕石雷, 元志辉, 乌日陶克套胡.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机制 [J]. 中国沙漠, 2022, 42 (6): 255–265.
- [38] 李冬花, 张晓瑶, 陆林, 等. 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J]. 经济地理, 2020, 40 (5): 70–80.
- [39] 薛明月, 王成新, 窦旺胜, 等.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 (4): 94–99.

##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grade Scenic Spo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YUAN Dan, WU Runhan, LI Do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11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nine provinces and distric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the study area. Using analytical methods such a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quantitative spatial relationship model, spatial mismatch index, and 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w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level scenic spo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the same time, a geodetector is used to detect the domin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spatial relationship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level scenic spo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its spatial clustering pattern shows a significant “high-high” category and “low-low” category with a wider distribution range and continuous agglomeration, and “high-low” category and “low-high” category with a narrower distribution range and more dispersed characteris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level scenic spo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the upper to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s characterized by “positive dislocation-negative dislocation”;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level scenic spot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a variety of factor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domin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spatial relationships is significant.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evel scenic spot; spatial clustering pattern; regional differences